

经济循环论与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刘建明

摘要 经济的每一次增长都是循环过程中某一环节的更新。经济发展是多种环套啮合系统,当某个环节滞后,失去对其他环节的适应,生产力就要暂时遭到破坏。经济运动每个网格、每个侧枝循环都不可忽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系统的循环,集中表现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及螺旋式发展。当生产力发展超过居民消费的增长,增加国民收入成为“生产、分配和消费”循环中的击发性环节,由此牵动经济增长点的出现。在解决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之后,依据国民经济总值的增长,以按劳分配原则及时向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消费基金,保证供需双方旺盛,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关键词 经济循环 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点 消费基金

“经济循环”不同于“经济周期”,但包含经济周期的全部内涵,指经济在闭合网络中的螺旋式增长方式。

社会经济的每一次增长,都是循环过程中某一环节的更新,而消费基金的有效投入则成为增长的总支撑点。当代世界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冒着通货膨胀的危险,随即实行高工资政策,才得以清除经济循环的梗阻,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广袤的大国来说,认识消费基金的投放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一、经济循环规律的刚性运行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富有复杂制约因素的机体都是循环演变的。经济运动是

社会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合体,也是循环发展的。

经济循环是社会机体循环的主要部分,其循环脉络是个多网络、多侧枝系统。经济周期是这种循环的表征,可称作外在总体循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发展要不断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到再繁荣的循环过程。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都会出现这四个阶段的螺旋式发展,不同的是,由于政治制度本身调节能力的强弱,循环的频率、幅度和持续的时间有很大差别,每次循环对生产力质量的提高也有明显不同。

经济外在总体循环即经济周期的演变,取决于若干侧枝循环的状况,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同生产力发展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循环,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循环,从生产者素质、科学技术进步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循环,产业结构内部

比例关系的循环，生产、分配和消费相互作用的循环。这些侧枝循环沿着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环形线路复归，呈现循序渐进的闭合网络式运动，最终推动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所谓闭合网络，是指这些循环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外界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不能根本扭转循环路线，因此它是刚性的。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改变循环中各因素的制约，除非以破坏经济发展为代价来切断这种循环。

经济循环无疑是个不幸的过程，因为每个循环要素和阶段都互为条件，也互为苦果的吞食者。但这只是阶段性悲剧。一旦度过循环中某个环节的失调性变动，经济运行的再生就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光辉前景。例如，生产力的进步要求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素质，生产者素质落后，即使占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手段，也无法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者就要吞食苦果。这时，经济发展要求生产者提高教育水平，进而提高生产技能和科学管理水平，使生产力获得新的发展。在生产力新一轮发展的终点，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又使多数生产者的素质落后了，还需要进行新的教育培训。如此往复不断，使经济运动呈现循环过程。

经济循环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经济发展是一种环套啮合，当某个环节发展到一定水平超越下一个环节的适应力，使生产力的正常发展遭到破坏。经济发展的良性秩序，来自经济体内各环节的相互协调，某个环节如果对其他环节发生遏制作用，理顺这个环节成为经济变革的重要使命，也是寻求经济增长的机制性调整。

二、在经济循环中选择 经济增长点

经济运动的每个网络和每个侧枝循环都

不可忽视，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系统的循环。在经济运行的每个环节，参与经营活动的人都以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作为目标。

尽管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异常复杂，但最核心的内容是利益原则。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工人、农民勤奋劳动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利益原则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和按劳分配。一旦利益原则失衡或遭到践踏，生产效率就要降低，经济运行就会进入衰退期，这样，经济价值和利益的每一次调整，都会使经济运行产生或中断新的循环。

从根本上说，利益原则是“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一经济循环的起动点。经营者和劳动者获得的利益越大，收入越多，消费需求愈趋旺盛，越能推动生产加速发展。当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如果社会消费水平滞后，生产必然受到抑制。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和消费相互作用的观点建立了经济循环论的理论基础，为摆脱经济衰退找到了一条线索。忽视这条经济规律，就会使生产者的劳动兴趣降低，或由于资金投向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居民购买力萎靡和产品积压等一系列问题，企业停产、工人失业（或开不出工资）等经济衰退的征兆开始暴露出来。

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单表现为社会总需求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消费质量的提高。当生产力发展超过居民消费收入的增长，生产耐用消费品的一些企业首先出现产品积压，由此牵动大量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生产停滞。如果社会建立了大量生产高消费或“亚消费”品的企业，而绝大多数公民的收入还不足于大量消费这些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大部分企业必然效益萎缩。这时，增加国民的收入便成为“生产、分配和消费”循环中的击发性环节，由此牵动经济增长点的出现。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选择和需求，即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和实现这种需要的可能。当国民收入增加到能够购买款式更新、质量更好的服装，发展轻纺工业就成为经济增长点，于是大量纺织厂建立起来，由此牵动纺织机械、钢铁、化学纤维、电力、棉花种植和牧业等行业的发展。当国民收入增长到足以买得起小汽车时，汽车工业成为新的增长点，由此带动钢铁、公路交通、橡胶、微型电子产品、炼油等行业的发展。如此等等。在经济循环中出现的增长点一般是由居民的消费需求确定的，而消费需求又是由国民收入的增长带动的。

三、消费基金充足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这里存在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万古之谜，即先有生产力的提高还是先增加劳动者收入。由此，产生了两种经济学观点。一种认为，先致力于生产发展，创造出大量社会财富，然后才能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另一种观点认为，先向社会投放一定数量用于消费的货币，刺激生产要素的快速聚集，使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后一种观点往往被视为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换取经济发展，甚至认为是破坏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这两种措施应交替使用。二者衔接的时空非常紧密，稍有较大间隙就破坏经济的有序循环，遏制生产的发展。当企业看不到社会有新的需求时，就总是小心翼翼地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不敢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那些大胆开发新产品的企业一旦产出批量的先进产品，在一两年内销售不出去，就要陷入负债累累的困境。社会需求狭小、消费水平过低，即使生产出大量先进产品，也只能是浪费资源。因此，对经济发展

的宏观调控，关键在于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及时向社会投放充足的消费基金（主要指个人消费基金），保证供需旺盛。

经济现代化以产出高科技含量产品为标志，购置生产费用高的商品又是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实行适度高收入和高消费必然成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前提。当城市工薪阶层的月平均工资仅仅达到500元的水平，就全面推行住房改革，吸引人们购买私人住宅，期望由此带动其他产业增长，只能是一句空动的经济口号。因为在低工资条件下，城镇80%的劳动者倾其一生的积蓄，也只能买得到50平米住宅的几面墙壁。同样，当广大农民和多半市民买不起高档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高级呢料和价格昂贵的一切生活耐用品，而这些产品却堆满了商店的货架和企业的仓库时，生产萧条的严酷灾难必然降临。比如，1994年我国轻工业增长19.6%，而同期社会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长率城市为9.5%，农村仅有3.45%。1996年生活用品的销售额占轻工业产值的比率仅有40%左右。可见，消费需求远远落后于生产总量的增长，经济发展的市场动力明显衰减。从60年代起，西方几个大国和日本出现经济高速发展，无不取决于大幅度提高国民的工资和薪金收入，培育市场需求，推动了经济的阶段性繁荣。而每次循环的复苏阶段，大都是由提高国民消费基金开始的，而它的持续发展，又是由国民坚挺的购买力支撑的。

在6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收入分配政策能脱离增长政策而存在，并可在以后再加进去，从而获得任何需要的“分配”。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美国在1969和1974年间社会保险费增加了一倍，福利费支出在1974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家庭月平均收入由1950年的约300美元，增加到1200余美元，家庭消费由1950年的1500余美元

上升到 4139 美元。到 80 年代中期，处于中等平均收入的美国中小学教员的月收入约为 2000 美元，3 年的积累可买一辆汽车，10 年后可买一套 150 平方米的住宅。据 1990 年的数字，美国每百人拥有汽车 73.9 辆，电视机 65.8 台，电话 78.8 台，64% 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在六七十年代实行分配适应增长的政策，美国的汽车工业、家电业、住房业及其相关的产业就不能迅速发展。

在 50 年代初，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中国相差无几，每台黑白电视机售价 20 万日元，而中等水平的工薪收入者的月薪只有 3 万日元左右，他们只好望洋兴叹，电视机产量全年才为 866 部，更谈不上购买汽车和住宅及发展汽车和建筑业。到 1961 年，全国劳动者家庭平均月收入提高到 8 万余日元，1982 年又增加到 40 万日元。日本推行高工资政策，使多数家庭的月收入可买 2~3 台大屏幕彩电，3~5 个月可购置一台轿车。这样，日本仅用 10 余年，家电、汽车和建筑业就高速发展起来，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四小龙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消费基金大幅度增长期，由于向个人消费投放充足的货币，仅在十几年间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形成的重要经济规律值得重视：（一）社会给劳动者提供的工薪只能维持生存的需要，生产就要徘徊不前；经济发展以提供基本的衣食为临界点，社会和现代化毫无缘分。（二）当大量企业生产出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而社会给劳动者能够提供购置这类生活用品的消费基金，经济发展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经济的全面繁荣才能长期持续。（三）各类企业创造了巨量财富，GDP 每年虽以两位数增加，但由于不能及时向国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来消费这些财富，会出现大量产品积压，企业资金严重不足，开工率急骤下降，微观经济运行恶化。

（四）社会消费能力有限，只能使一部分活力充沛、产品质量好的企业保持赢利，亏损企业即使进行了适应市场的彻底改革，但原来的亏损面仍不会缩小，因为由购买力体现的市场容量并没有扩大，产品销量不会增加，改革的结果只能使亏损主体转移。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改革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和产业结构，要以提高居民购买力为重要条件。

四、通货膨胀与 消费基金投向

投放充足的居民消费基金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家和社会管理部门始终担忧的问题。正是这一高悬之剑，使他们在产品过剩时一筹莫展。但只要消费资金投放量和投向合理，注入的时机成熟，就不会产生或不会出现太高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常是指总货币流通量超过了商品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产生通货膨胀的多数情况是社会缺少人们需求的产品，导致物价上涨，不得不投放大量货币来平衡，造成物价再度飞涨。本文所说的消费基金增长，是指在社会财富增长、产品开始出现相对过剩时的货币注入，而不是随意向社会投放巨量的货币。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莱德勒指出，“通货膨胀是一个价格持续上升的过程，也等于说，是一个货币价值持续贬值的过程。”物价是否上涨，主要取决社会产品是否丰足和市场调控能力，和消费基金的增长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大量投放消费基金不等于通货膨胀，不一定引发物价上涨，这要看货币投放量是否超过了 GDP 的增长。日本、西德在近 20 年中许多年份工资增长率虽然超过了两位数，物价上涨的幅度却仅为 4% 至 5%。美国在里根时代，严格紧缩货币，抑制

通货膨胀，虽然物价明显回落，但经济回升仅持续了一年半，从1984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下降，不得不以扩大军费刺激经济增长。

实际上，只有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增加工资才能提高消费水平和劳动者的活力，使经济保持发展势头。如果工资提高10%，物价也提高10%，等于消费基金没有增长。进入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平均工资要比我国公民高几十倍，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不比我们这里贵。每次涨价，为了保持社会需求旺盛，同时按涨价的幅度给公务员和盈利企业的劳动者提高工资或补贴。

我国在16年的改革中，产品价格上扬过猛，商品价格和它的实际价值反差太大，绝不是消费基金投放量过大，更不是产品不足造成的。大幅度涨价的原因是，几乎所有产品多次倒手，层层加价，或销售环节漫天要价，许多奸商谋取了暴利。多数重工业和精加工产品生产成本低，销售环节收费多、浪费大和腐败支出惊人，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价格已经昂贵得离奇。一方面有近万亿元的日用消费品积压，另一方面售价高，广大职工和农民收入低，买不起，社会消费的供需比率没有按预期的愿望增长。可见，我国物价上涨和消费基金增长的额度无关。实际上我国每年工资增长的比率很小，1995年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资增长幅度仅为3.8%。据初步统计，1996年全国职工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约为10%，而物价上涨为7.6%至6.4%，实际增长幅度不足4%左右，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率。

增加消费基金投放的额度，应把握在上一年增加的最终产品产值的80%以下，投放的时机选择在产品总值超出社会消费力的年份。例如：当出现产品严重过剩，而内销和外贸的年销售额仅达到年产值的30%时，就应把工薪提高到国民总产值的50%（含救济

金），其余20%的最终产品的产值作为库存和积累，以防出现特殊情况对最终产品的大量急需（例如自然灾害、战争和突发事件）和扩大再生产。即使每年按照这个速度增加国民的工薪，也不会使国民财富消耗一空，因为每隔5年积累的产值就达到基期产值的100%。如果有的年份GDP下降，不仅不能增加工资，效益下滑的企业还要减发工资。消费基金投入的上述时机和合理比率，不可能形成过度需求，出现物价上扬，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最可怕的因素，是国家对企业投资规模过大，不断进行重复建设。政府把货币投向生产要素死寂的地方，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近10年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每年平均达1万亿人民币，1992年和1993年投资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42.6%和58.6%，1996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突破2万亿元。投资需求膨胀，经济总量失衡，孕育着潜在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注入大量资金搞集团消费、公款消费和各种补贴，使许多人无偿占有国有财富，形成“馈赠式通胀”。与此相反，消费基金要投向每个有创造力的劳动者，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对失业者，要发给与其工龄或工资比例合理的救济金，回报他们在就业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即使国有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大都要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例如实行股份制）或贷款取得。这是推动经济循环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金融政策。否则，不仅通货膨胀压不下来，而且由于产品积压造成企业严重的债务重负。比如，消费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无钱购房，住房分配只能导致不公平的无偿福利。一方面国家每年大量投入资金建房，另一方面商品房大量积压，几千亿资金收不回来，根本原因是钱投错了地方。如果房地产业通过贷款或实行股份制取得资金，全国职工大幅度提高收入后经过

5至10年的积蓄就可购置一套住宅(或在这一期间能够偿还购房贷款),建筑业必然出现良性循环、持续高效益的发展势头。

五、消费基金的协调增长促进全面、健康的经济循环

大幅度提高公民消费基金,并不需要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只要改变原有的资金投向就能保证消费基金协调增长。国家除把对企业不必要的投资转为消费基金外,还要压缩集团消费和各种补贴,再把企业办社会的大量福利费(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住房)也打入工资(含社会救济金)总额,足可以促成工资大幅度提高。消费基金的协调增长,是指它要随着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的幅度相应增长,逐年扩大递增额。经济发展的历史成果是个可把握的经济量,从上一年度的产值中确定下一年度分配的比率,在统计学上并不是难题。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条件,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工资收入不要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逐年提高。重要的是,要坚持分配的公正原则和适度、持续增长的原则。

分配消费基金的唯一公正原则是按劳分配,不是随意给任何一个劳动者增加工资。其他分配方式也应以正当的劳动收入为基础。在吃惯大锅饭、按资历而不按能力和效率分配劳动报酬的社会,人们拼命攀比收入,却不攀比对社会的贡献,这是长期戏虐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恶果。以法保证机会均等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前提。想获取高报酬的人必须能胜任高效率、高智商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可通过考试或考核进入竞争程序,决定是否有能力获得这种机会。坚持这一公平原则,就不会产生不看贡献而攀比收入的倾向,借助走后门、拉关系进入分配领域的人身依附体

制也会随之消除,以投机取巧、贪污诈骗掠夺人民财富的不法行为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收入公平不在于人们获取利益的多少,而在于每个人占有的财产是他应当得到的。

早在1992年,人们多次预测我国2万亿私人存款可能冲垮市场,至1996年,又有人惊呼近4万亿私人储蓄要杀向市场。但预言一次次变为皂泡。岂不知,1亿4千万城镇工薪阶层从1983年的100元到1996年的500余元的月平均工资和广大农民的低收入,仅够维持温饱生活,在13年间怎能积累4万亿的私人财产?人们在盲目的乐观中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少数人(约占12亿8千万人口的4%左右)窃取国有资产、经商谋取暴利、走私贩私、公款私存、偷税漏税可能占有3万亿。这种掠夺式分配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使绝大多数人占有消费基金的份额很小,国民的整体购买力极其有限。据统计,最近两年,全国人口每月对家用工业品的平均消费额仅有16元,只能买几枚上等衣扣,这种消费水平使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根本无法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主,高收入一旦进入勤劳或富有创造精神的家庭,生活提高将进一步释放出他们的创造力。一批发明成果累累的科学家、高级技师,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很快把科学技术推向前沿,迅速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使生产力不断更新和质变,新的科技要素和卓有成效的管理将不断推动经济出现新的增长。

农民收入低,是抑制消费的突出矛盾,而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只能来自城镇职工的富裕。城镇居民工薪大幅增加,随之按一定比例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农民收入才能激增。农民有了钱,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有真实的购买力,为整个工业的全面增长提供了需求。那些销售不出去的商品逐渐减少库存,停工的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失业的工人纷纷回到工

厂。农民有了钱，对农业生产加大投入，发展农业机械工业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工农业的平衡发展使经济循环快速运行起来。

职工和农民收入逐年迅速增加，每个家庭要购置两三台大屏幕电视和其他高档家用电器，要购买住宅、汽车，安装电话或使用多媒体系统，建筑业、汽车业、电子工业和邮电事业才能成为增长点。同时，他们的闲暇消费扩大，文化消费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增长点。高收入使国民子女自费求学成为可能，教育经费充足，教育改革才能健康地发展。人们富裕了，许多城乡居民在一天之内可能有两餐走进饭馆和公共食堂，外出旅游的人数也会大大增加……。这一切又推动了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失业的工人和裁减的政府冗员拥入这些行业，找到发挥才干的再就业机会。再就业由民间第二次分配需求来解决，国家不用花一文钱，也不用投入更大的社会管理，社会自组织作用在消费基金的流动中使就业呈现出良性循环。职工只要勤奋劳动，每年都有公平提薪的机会，社会分配公正，人民安居乐业、殷实富足，人心思定，社会自然会稳定。

人民手里握有充足的货币，除了消费还用于储蓄和投资，在低息情况下，民间资金的这种流向有利于生产和积累。严格地说，老百姓手中的钱越多，放在银行里才越放心，这些钱也就为国家所用。老百姓取出钱来消费，又是为企业启动“购置原料——生产——销售产品盈利”这一微观经济循环。濒临破产的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只要有了市场需求，产品滞销和资金涸竭自然会迅速扭转。

在高收入中，实行聘任制的政府公务员将拿上等工资，也要以最好的管理水平报效国家。高收入带来相应的责任感，国家的管理水平和效率将大大提高，大量压缩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同时提到日程上来。被裁减的人面对广泛的人才需求，不再有危机感，精简机构才可能彻底实施。政府严格依法向一切企业、一切高收入者征税，除了向国有文教事业、军工企业和少数大型国有骨干企业投资外，一般不再抛出大量资金实施膨胀的投入，同时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发放贷款为国民积累财富。政府的支出减少，财政收入剧增，国强民富的盛世迅速到来。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5日一版。
- 3 《经济学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 4 马洪等：《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 5 李京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
- 6 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7 龟井正夫：《日本经济腾飞之路》，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 8 王振基：《日本工资和社会保险概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 9 李家泉：《台湾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 10 杨松华：《港澳台经济简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责任编辑 匡 四)